

封面题字：方加光



蒲圻文史 第四辑

编辑：政协蒲圻市委、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刷：蒲圻市印刷厂

出版日期：1988年9月

(内部发行) 工本费：1.60元

目 录

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日子里

——回顾在苏联塔斯社的一段生活……舒宗侨 (1)

“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

——四行仓库保卫战一老兵的回忆……田有收 (16)

戎马生涯十五年

——原国民党南京国防部预备团上校团长起义人

员自述……陈安民 (29)

爆破铁路火车 暗杀日伪汉奸

——我在军统鄂南工作队的抗日活动……邱荣卿 (37)

蒲圻柳林大捷……黄纪新 余伯勋 (43)

同侵略军神田师团的斗法……胡允孚 (47)

姚善功智摸敌哨所……章修斌 (55)

“大盗亦有道”

——记张家羊儿……王 灿 (58)

奇袭日寇……马兆华 谢希文 王珩 余日武 (62)

开辟嘉、蒲、临抗日根据地……林 彬 (66)

虎口夺粮

- 为359旅和嘉蒲挺进支队筹粮的经过
.....陈古愚 (73)
- 抗战时期我在重庆五次见到宋美龄.....黄 冰 (77)
- 抗战时间成都金牛坝新村.....王良嘉 (82)
- 大学教授愁温饱
——记抗战时在重庆的蒲圻学者.....宋祖立 (84)
- 日机轰炸城厢镇.....马兆华 (90)
- 九岭邓家血与火的惨案.....邓秀峰 (93)
- 放牛场上的悲剧.....李天道 (97)
- 己乙卯日寇神山大屠杀亲历记.....李松全 (100)
- 己乙卯日寇“清剿”神山纪实.....龙 翔 (103)
- 日寇对蒲圻的经济侵略
.....马兆华 谢希文 王琦 余日武 (105)
- 三田和他设在石坑的洋行.....李耕亚 (108)
- 日伪勾结砍伐新店周围森林.....陈古愚 (111)
- 蒲圻伪军暴行略录.....江国忠 (113)
- 伪“和三师”组织简况.....章绍志 (119)
- “三多军”与“黑白菜”.....胡忠诚 (122)
- 蒲圻沦陷时期日伪组织及其主要罪行.....余日武 (124)
- 盟军飞机第一次轰炸蒲圻日寇.....余日武 (130)

铮铮铁骨一老嫗.....	黄纪新 余伯勳(132)
施巧计，饭中放毒毙日寇	李悌亚(134)
一场“失败了”的伏击战	李悌亚(136)
九土坂被焚纪实.....	冀老生(138)
日寇在石坑的暴行.....	陈 列(140)

张学良在蒲圻“视察”时的演讲.....	胡忠诚(143)
陆水河畔迎少帅.....	吴 英(145)
怀念余日宣教授.....	周树华 郑履仁(148)

城隍庙与王和尚.....	龚益辉(151)
--------------	----------

附录：

中央社电讯稿.....	(156)
-------------	-------

【 补白 】

《八百壮士》一曲的作者夏之秋先生.....	(28)
给叶挺独立团带路的人——刘凤鸣.....	叶逢鼎(42)
长沙大捷中所见.....	(46)
大刀进行曲.....	一 兵(65)
宋氏三姊妹到电台向美播音.....	(81)
播音员为蒋介石引播.....	(89)
过余家桥.....	王 康(92)
日军两少尉竞赛杀人.....	(96)
最先获悉“珍珠港事件”	(110)
傅作义惩赃官.....	(112)

张自忠将军怀乡爱民一事.....	(121)
高粱叶子.....	一 兵 (129)
小东洋.....	一 兵 (139)
请冯玉祥播音竟受到申斥.....	(142)
封面题字.....	方加光
封二照片.....	舒宗侨 徐仲来
封三照片.....	张海涛

舒宗桥，蒲圻市杨家岭乡人，在南京长大，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抗战前当过上海《立报》记者。1937年任塔斯社记者，奔走各战场实地采访新闻，1942年任《联合画报》主编，1947年主编出版《中国抗战画史》保存了大量重要历史照片。现任复旦大学教授，担任培养研究生任务，并任中国摄影协会领导的《中国摄影史》编委、《中国全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分支编委、上海社联委员、新闻学会理事。

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日子里

——回顾在苏联塔斯社的一段生活

舒宗桥

1937年“八·一三”战争爆发的两月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我告别了工作两年的上海《立报》，转入苏联塔斯通讯社任记者，由上海到南京、又到武汉、再到重庆，直到1939年9月左右，因被军统逮捕后释放而离开了，在塔斯社工作了两年时间。这两年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战的美好时光，国共合作期间虽有摩擦斗争，连我自己后来也不幸做了斗争的牺牲品——失去了五个月的自由，但总的来讲，在大敌当前，强邻压境的危难时刻，国共间捐弃前嫌，携手抗日，全国上下，投入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一致对外，这段历史今天回想起来，仍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能打下这八年抗战，直至日本投降，未始不是由于国共两次合作，全民一致，对外奠定了抗战基础的结果。

为了抗战不怕戴“红帽子”

我和塔斯社的联系，远在1935年进入《立报》时就已开始，1937年“八·一三”战争爆发，因为我担任《立报》记者，经常为塔斯社提供重要战斗消息，每天均与该社社长罗果夫在国际饭店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碰头，到10月初，战争愈来愈紧张，上海外围相继被日军占据，南市和闸北行将不保，罗果夫邀我进入塔斯社，助其采访和到南京发稿，我遂于10月1日进塔斯社工作。

塔斯社是苏联官方的新闻机构，由于它是一个共产党机关，人们对它多少有点神秘感，也有人认为它与中国共产党必有密切关系。我虽不是共产党员，进去工作是否会戴上“红帽子”，未始没有疑虑。但在抗日救国的总目标下，国共双方宣布合作，与全国人民联合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思想指导下，我作为一个爱国的青年记者，也就毫无畏缩地并引为自豪地进入了塔斯社。

南京弃守前夕

中共是在1937年9月22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的。在这时许多关在苏州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被释放出来；中共还在南京傅厚岗66号设立办事处，距离塔斯社不远。有一天，后来曾担任《新华日报》重要职务的章汉夫同志来塔斯社聊天，讲到国民党已同意出版《新华日报》，该报正在筹备之中，我和罗果夫听了均非常高兴。又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先生，听说塔斯社已在南京开始工作，特驱车来访，与我们交谈好久。我们觉得国民党当局很重视中苏关系，堂

堂部长首先来访问塔斯社记者，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好事。邵力子是复旦大学的老前辈，我是复旦校友，自从这次会见之后，邵先生一直关心我在塔斯社的工作，把我在那里工作，看成是有助于中苏关系的国民外交活动。

上海战事告紧，外国记者纷纷由沪来京，有次各外国通讯社、报纸的记者在包括路透社、塔斯社、哈瓦斯社、德新社、《纽约时报》、《曼彻斯特导报》的中外记者十多人，曾在南京中华门附近一家著名的牛肉馆聚餐，连连干杯，充满了国际团结友好的气氛。

1937年10月——11月间，外国通讯社在南京发中文稿的，仅塔斯社一家。我们当时只有四个人，我与罗果夫之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俄国人。我负责翻译从莫斯科发来的英文新闻稿，将其译成中文，油印送给各报，当中日战端揭开，中国正需要国际声援时，塔斯社于此时来首都发稿，给予国民党政府的鼓励是很大的。

塔斯社在南京发稿约四、五十天，11月5日敌军在上海金山卫登陆，不数日福关线国防阵地落于敌手，中国军队11月13日放弃上海，首都南京立即受到威胁。国民党政府考虑到死守南京将消耗过大，得不偿失，决定改变固守的计划，12月13日南京就沦陷了。

汉口时期的塔斯社

我于11月21日匆匆辞别了家人，乘轮船离开南京到达武汉。到汉以后，塔斯社觅定了湖南街（现名胜利街）《英文楚报》大楼二楼为社址。路透社和在汉已有30多年历史的英国人办的《英文楚报》（The Contral China Pbest），

设于楼的底层。当时武汉到处弥漫着抗日救亡的歌声。楚报大楼对面是一所小学，小学里住着一批战地服务团的青年男女，他（她）们从早到晚，那种慷慨激昂，有时夹杂些悲壮的歌声，至今还盘旋在我的耳边。

塔斯社虽然是一个苏联新闻通讯社，但是除社长罗果夫和两三名俄国人外，大部分却是中国人。苏联籍的战地记者来来往往，他们大部分住在苏联领事馆里，偶尔到塔斯社来转转。塔斯社和其他外国通讯社不一样，中外同事相处比较随便，工作之余，大家经常说说笑笑，像个家庭一样。社长罗果夫是个工人出身的记者，在苏联学过汉语，能说一口过得去的中国普通话，他喜欢吵吵闹闹，高兴起来和 Boy（即工友），也会拥抱起来，至于编辑、记者、翻译那就更别提了。这种和谐的气氛，也反映着当时抗日救亡期间人与人的关系。

一个国际团结的俱乐部

由于对日抗战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持，武汉时期的塔斯社几乎成了一个国际团结的俱乐部。这里来往的客人，既有《新华日报》的章汉夫、戈宝权，《大公报》的范长江，生活书店的张仲实……也有中央社的刘尊棋、饶世芬、徐怨宇和各地分社的记者，外国朋友如爱泼斯坦和外国记者斯沫特莱，波兰女记者苏伊斯等均到斯塔社来过。他们的来访，多半是交谊性质，随便聊天，有时也交换些消息。

塔斯社通过它的记者采访、战地来人谈话、翻译报刊文章消息，中央社和国际宣传处的供稿、中国官方的记者招待会、参加武汉群众集会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取得新闻。我们时

常接待从前方或游击区到武汉出差的军政人员以及新闻记者，获得材料。塔斯社对军事消息固然重视，而对一般群众游行示威、游击战、人民抗战情绪，也很关心。1938年8月5日，我与罗果夫曾一同访问从苏联归来的东北游击战的抗日领袖李杜将军，他全面介绍了近年东北游击战的情况。9月2日河南游击队的许靖远，来社介绍他们怎样于8月8日在安阳附近的西曲沟围歼日军长川少将汉奸“剿共军”李福和的故事。这些真实的游击战报道，塔斯社都非常感兴趣，往往不惜用电报打回莫斯科。

受欢迎的外国记者

由于国共合作，苏联同情中国的抗战，是最先在军事上支持中国抗战的。塔斯社记者在新闻采访过程中，就沾了许多光，比较容易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只要一听到是塔斯社记者，都表示非常客气。记得1938年2月10日，我与罗果夫、谷宾斯基三人访问徐州前线，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他在那样紧张的战斗时刻还和我们在五战区长官部坦率的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晚我们随同抗日英雄、59军军长张自忠将军的专车开赴淮河前线。张将军只身来到我们的车厢，讲中国军人为什么要抗日，在那漫漫黑夜中，听到张自忠的一席话，我深深地体会到“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在固镇前线司令部里，我们还见到津浦南段正面总指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将军，在炮火连天的夜晚，大家一起共进晚餐。我们在淮河前线逗留两天，13日回到徐州。

塔斯社当时有好几个战地记者，我还记得他们中文名字的有谷宾斯基、查格拉斯基、勃洛金、亚可勃夫、瓦理叶

夫、葛勃金等人，这些人到前线都有中文翻译陪同，他们通过国民党军委会和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关系，前往战地采访。这批苏联记者在前方的任务，除提供军事消息之外，是否负有搜集军事情报，特别是关于日军的情报的任务，我不敢说。这批人究竟是新闻记者，还是军人，我也难说。有次，社里来了十几位彪形大汉，都穿着黑皮大衣，由罗果夫给他们介绍情况，又替他们印了“苏联塔斯社记者”的名片，我猜测他们都是军事人员。当然，这种人员到前线活动，是得到国民党军委会和蒋介石认可的。因为那时，在军委会下就有苏联军事顾问团的组织，团长就是后来的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而那时的中国空军，一部分也是以苏联飞机和志愿空军组成的。有这样一些客观因素，塔斯社记者在外边采访新闻，就比较容易受到欢迎。我在前方采访时，多次听军队将领向记者表示，希望苏联空军能多多飞到前线助战。我于2月间前往徐州时，经过平汉线孝感时，也亲眼看见苏联志愿空军，作巡逻和飞行训练。

只要抗战到底，中国必然胜利

1937年冬，大家从沿海和华北撤退到武汉时，人心有些慌张，对于中国能不能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在军事失利的情势下，难免滋生疑虑；国内“抗战亡国”的谬论，又有抬头。为此，文化界抗敌协会的沈钧儒等多人，于1938年1月5日在汉口“一江春”邀请各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请周恩来讲，他说，我们今天任何一党一派，再没有自己的利益，因为国家亡了！党也是亡国的党，派也是亡国的派，有人说，我们将来不忘于日本，即亡于苏联；而我敢说，中国

抗战的结果，既不亡于日本，也不亡于苏联而是必然的胜利，其结果将使中国获得自由、平等与光荣！这几句话，我当时清楚地记在一本日记上（这本日记至今还保存着），他的话反映着中国共产党持久战的理论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经过八年抗战，这种远见也终于应验了。

10月6日，军委会有位姓孔的军事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对日方的兵力和当时的军事形势作了分析，他的结论是“从我们军人来看，这次战争是胜利的。”所以尽管当时我们已丢失了南京、太原等战略要地，军心民心都未根本动摇，大家都相信，只要抗战到底，就必然胜利。

从1937年11月21日到1938年10月22日武汉快失守时，我在武汉逗留近一年的时间，获得的印象是：这一年武汉的战时生活是安定、紧张、奋发、热烈……；在人民群众中悲观失望以至对敌屈服的思想没有地位。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1938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武汉举行了大规模游行，各处游行队伍踉踉跄跄，歌声响成一片；3月27日，敌机五、六架反复空袭武汉的这天，武汉文艺界抗敌协会开成立大会，冯玉祥、郭沫若、田汉、老舍等均出席发表演讲；还有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发言。

4月，台儿庄大捷后，武汉连续庆祝了7天，13日那天，有30万人在中山公园集会后游行；不论男女老少、以至人力车夫、乞丐都到献金台上自动献金。“八·一三”周年，全市发动了30万封慰问抗战将士的献信运动，有个孩子在信上写道：“我讨厌胡子，我伯伯有胡子，我不愿他亲我的脸。你有胡子吗？要是你有胡子，我只好让你亲了，因为你是民族战士嘛！”

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

苏联对华的援助，首先表现在1937年8月21日（即“八·一三”开战后第八天），就和中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同时于29日公布。该约重申了1928年“非战公约”的原则，并规定一国受侵略时，另一国不得予侵略者以任何协助。当中国军事、政治中心移到武汉时，苏联的飞机、大炮和军事顾问团已到达武汉。蒋介石夫妇在武汉亲自接见了顾问团和志愿军人员，并摄影留念。

中日双方的空军力量，当时是很悬殊的，开战时日本有2500多架飞机，而且自己可以制造飞机；中国只有五、六百架飞机，自己却不能生产飞机。开战以后，日方以其空军优势，在淞沪战争时曾猖獗一时，可是我国空军虽数量有限，但士气高昂，斗志坚强，屡次予敌以重创。就以1938年“二·一八”空战而言，我方在12分钟内就打下敌机12架，自己损失4架。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敌机从佐世保来袭武汉，在这次半小时的空战中，先后打下敌机21架。有位苏联飞行员，一个人这次就打下了3架日本重轰炸机。

1938年7——8月，日苏间发生张鼓峰军事冲突，此事引起我国上下关切，最后日方屈服。这一事件，虽然未能像我方一般人希望的那样造成日苏军事冲突，但至少起到牵制伪满境内关东军的作用。在日苏接触的日子里，塔斯社是军事冲突的报导中心。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国民党党国元老于右任为《新华日报》创刊书写报头，并题赠“热忱爱国”四字，冯玉祥将军的题词是“大众喉舌”。在同一时

期，中共还出版了《群众》周刊。《新华日报》除大量刊载有关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消息，和塔斯社的国际新闻外，同样刊载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稿。“七·七”一周年，《新华日报》出版了《抗战建国纪念日特刊》，把蒋介石的《告世界友邦书》作为头版头条刊出。

5月1日国际劳动节，武汉有8万工人和三镇集会游行，庆祝“五一”劳动节。5月19日中国空军远征日本三岛，胜利归来，中共中央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特送锦旗致敬。7月1日国民党政府成立国民参政会，参加代表有各党派、各界人士，中共参政员有毛泽东、林祖涵、董必武、陈绍禹（王明）、吴玉章、秦邦宪（博古）、邓颖超等七人。

9月29日毛泽东致函蒋介石，强调“统一团结”之重要。语句至为诚恳坦率，内称：“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民无不崇仰。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同人认为此时期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这封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和当时对团结抗战的必胜信心。

冯玉祥谈枪毙韩复榘和汪精卫叛国

1938年和1939年里，我和罗果夫及其他苏联记者，曾先后两次访问冯玉祥将军。

第一次谈话是2月25日在武昌千家街福音堂里。那天冯

玉祥穿着一身棉大氅和军装，他分析了中日双方军事对比，讲到韩复榘枪毙后，部队士气大振，韩的部队攻入济宁、汶上、津浦南段，我方正以5个师兵力会攻滁州，在平汉线上，战斗在清丰、南乐的是一位行政专员丁树本领导的游击队。

第二次谈话，是1939年1月15日我们访问西康回来路过成都时，在四川省政府待招所相见，他这次主要谈的是关于汪精卫的叛国。他说：“汪精卫这个人我早就看他靠不住，1936年我从泰安回到南京，那天正巧他在南京中央党部遇刺，当时就有人向我说，汪精卫近几年思想变了，他的国家观念动摇，已非一日。我在察哈尔抗日，在多伦多牺牲了一千六、七百人，团长死了4人，汪精卫居然违背良心，说我没有损失。在武汉时，鹿钟麟告诉我，前方一打败仗，汪精卫就高兴，打胜仗反而懊丧。这次叛国，是他相信日本首相近卫所谓的‘和平’，把近卫说的‘不需要赔款’也信以为真。”最后冯玉祥对汪提出八个大字的批评：“利令智昏，心劳日拙。”并肯定汪的阴谋是一定要失败的。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活动

1938年3月30日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是一个以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记者为骨干，团结各种政治派别的报社、通讯社新闻记者为一体的青年记者组织。我和当时中央社记者徐怨宇，武汉日报社记者徐叔明三人被选为“青记”武汉分会的常务理事。这个会，在武汉进行过许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和团结一切同情、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新闻、文化界朋友的活动，如1938年4月1日创刊《青年记者》刊物（我

在上面写了一篇《抗日时期的新闻政策》的文章），5月19日徐州沦陷，有不少记者被包围在内，其中也有塔斯社的记者。后来这些人陆续回到武汉，“青记”武汉分会于7月4日在汉口“普海春”举行一次招待会，欢迎他们从战地归来。被欢迎的有中央社的丁继昶、张明烈，大公报社的孟秋江、外国记者斯沫特莱、斯诺，云南日报社的李冠东和在天津被日军逮捕逃出的老记者王研石等。还经常为外地或前方来汉的中外记者提供各种工作和生活上的协助等等。

可是，就在“青记”正式成立的那天，就遇到国民党右翼分子的阻挠和破坏，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康泽公然指责大会“不合法”；其后，国民党宣传部门又指使少数地方报纸的记者进行种种抵制和反对活动。但“青记”不仅无所畏惧，并积极开展活动，先后在长沙、桂林、成都以致延安等地成立了许多分会，在各地报纸出了十几种记者副刊等等。“青记”还在各地有分会的地方，办了“记者之家”，我从武汉撤退，中途轮船被炸，辗转到达长沙时，就是住在“记者之家”的。

《新华日报》专轮被炸历险经过

塔斯社为坚持发稿，应国民党国际宣传处之请，一直留到武汉快沦陷时才撤退。那是1938年10月22日，我和同事安世祥、工友宋海泉三人搭上《新华日报》社的撤退专轮“新升隆”向重庆撤退。船上除新华日报社职工四、五十人外，还有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人员李克农、边章五等，连同五十多位难民共150余人。22日下午离开武汉，23日晨驶至嘉鱼县的燕子窝躲避敌机空袭。下午3时许正准备继续航行时，敌

机临空又对“新升隆”进行轮番的狂炸，并扫射机枪。我这时正行到船边未上船，眼看到船只炸光烧光。傍晚时清点人数，共死了50余人，计《新华日报》16人，八路军办事处8人，难民20余人。

塔斯社3人幸免于难后，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跋涉，于27日到达长沙的早晨，看到报纸，知道汉口已于10月25日沦陷。当天，中央社就把新华日报“新升隆”专轮被炸，以及该报记者潘美年、李密林等遇难和我到长沙的消息公布出去。当时，周恩来刚刚从武汉坐汽车到长沙，他特为此事到“记者之家”来向我了解情况。那时，乘此轮来长沙的新华日报与八路军办事处人员包括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李延禄、王炳南，两名外国人士安娜和尤·简恩还在途中，因为有伤员关系，走了20多天才到长沙。

走在国共团结的路上

10月23日在燕子窝被炸的这天，我们到乡下去避空袭，就在那偏僻的乡村里，也看到“国共团结，一致抗日”的标语，可见人民关心国共两党的关系。在长沙，11月2日听叶剑英在青年会演讲，他讲到中国的抗战，对内对外都有个团结问题，“广州的失守，就是一部分军人不顾团结，妄图保存实力造成的。国际上，中国可靠的朋友只有苏联（讲至此，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英美不甘于中国接近苏联，亦必起而援助中国，这种援助，中国应当争取。”这里也表白了共产党对团结的态度，并不因英美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予以排斥。“青记”于11月4日在长沙青年会举行座谈会，谈抗战时期的新闻政策问题，我在会上发言，主张新闻从业人员和